



马克思主义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新观点

鲁克俭

2008-05-26

共产主义思想是马克思思想和理论的重要内容，加之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成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因而国外马克思学者一直非常重视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考察，并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深入研究得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本文试图对这些新观点做一梳理和评介。

一、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早期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考察

众所周知，把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早期和晚期是西方马克思学者的普遍做法，而一些学者则进一步把马克思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称之为“哲学共产主义”。R. 塔克就是其中的代表。

1961年美国著名马克思学家R. 塔克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该书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迄今已经出了三版（第三版于2001年出版）。塔克在书中明确提出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早期的哲学共产主义阶段，并就此作了深入考察。

关于德国的哲学共产主义，恩格斯早年曾经明确提出它是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一文中恩格斯说：“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既然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并且是——尤其是——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那他们就决不愿意也不会摒弃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应该完成的任务如下。我们的党应该证明：从康德到黑格尔，德国哲学思想的全部成果不是毫无裨益，就是比毫无裨益更坏；再不然这种努力的最终结果就应该是共产主义；德国人要不抛弃使本民族感到骄傲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就得接受共产主义。”[1]恩格斯还指出，赫斯是德国哲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而卢格、马克思、恩格斯、海尔维格等人是其中的成员。塔克很看重恩格斯的上述意见，并且进一步指出：尽管马克思1843年9月在给卢格的信中仍然把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或乌托邦，以及相应的设计未来的观念斥之为“教条的抽象概念”，并明确指出只有通过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才能发现新世界，但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准备接受赫斯发展起来的德国哲学共产主义框架内的共产主义观念。不过马克思的哲学共产主义朝向了一个不同于赫斯的新方向，这就是加入了赫斯的哲学共产主义所没有的无产阶级观念。[2]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了赫斯一派的哲学共产主义即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

塔克还进一步指出，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头脑中的无产阶级形象并非来自于经验的观察，即不是来自于对工厂状况的考察，也不是来自于同产业工人及其工作的亲身接触，甚至也不是来自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与工人阶级最早的接触发生在他1843年秋末移居巴黎之后，但在此之前马克思头脑中已经有了无产阶级的概念。在1843年底写成的《〈法哲学黑格尔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到了无产阶级，不过这时的“无产阶级”还只是一个哲学概念，是马克思把“人”的自我异化中的“人”置换成了更具体的“无产阶级”。

那么这时马克思头脑中的无产阶级形象（即作为哲学概念的“无产阶级”）来自何处呢？塔克认为是来自书本，具体来说来自马克思所阅读的《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该书1842年在莱比锡出版，作者是Lorenz von Stein。施泰因1840年受普鲁士政府委派，在巴黎做关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学说的调查研究，并监视和报告德国工人移民中的共产主义活动。该书就是他亲身考察的研究成果。施泰因在书中指出，必须把“无产阶级”与“穷人”做严格的区分。社会上历来存在着穷人，但无产阶级的出现却是新现象。无产阶级不仅仅是赤贫的人，而是一群骄傲和反抗的穷人，是对抗社会（该社会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诞生出来）的穷人。他们

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受过教育，但又不甘心现有的命运。相应地，该阶级“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作危险因素。之所以危险，因为它有庞大的人数和巨大的勇气；因为它有团结的意识；因为它已经感觉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其目的，实现其计划。”塔克指出，马克思在《〈法哲学黑格尔批判〉导言》中的无产阶级就具有施泰因所描述的特征，而且下面这段话也直接源于施泰因：“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3]。

塔克并非第一个指出施泰因著作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产生影响的学者。吕贝尔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史”（1968年）一文中指出[4]，Davis Koigen[5]、Charles Andler[6]和Gustav Adler[7]都在其著作中强调了施泰因对马克思的影响。此外，西德尼·胡克在1950年出版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卡尔·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一书中也提到了施泰因对马克思的影响：“就人们所讨论的施泰因对马克思的影响这一问题而言，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施泰因预言无产阶级将不会在德国得到发展。”[8]

塔克指出，尽管发现了无产阶级并给哲学共产主义加入了无产阶级观念，但马克思并没有马上放弃哲学共产主义原则。关于哲学共产主义，恩格斯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虽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但它注定不只服务于本阶级的物质利益，而且还服务于“人”结束其自我异化的普遍精神需要；无产阶级对其生存状况的初步反抗，只是被非人化的“人”反抗其非人化的表面征兆。因此在《〈法哲学黑格尔批判〉导言》的结尾马克思宣告：“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9]塔克把马克思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思想发展都归入哲学共产主义阶段，并称其为“原教旨马克思主义”[10]。

美国马克思学者斯坦利·穆尔也认为马克思思想发展有一个哲学共产主义阶段。在《马克思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选择》[11]一书的第二章“从哲学共产主义原则所做的论证（1843-1844年）”，穆尔考察了马克思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穆尔指出，1847年之前德国共产主义的发展有两个来源，一是一些德国工人转向法国革命者所倡导的共产主义，这些法国革命者复活了巴贝夫的学说，这就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二是一些德国知识分子以费尔巴哈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发展出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的共产主义，这就是哲学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是一种道德批判，它运用人的本性理论作为评价现存制度的标准。批判始于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提出的人性解释。在费尔巴哈看来，所有的动物都意识到它们自己的存在，人也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本性。但人有别于其他动物，因为人既拥有外在生活，也拥有内在生活。外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意识到作为个体的存在；内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意识到他具有人类的本性。穆尔认为，这一学说是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把人看作类存在的理论基础。那么何种社会秩序最使人的存在与其本性相和谐？现实的资本主义交换经济使人非人化，驱使人成为每个人都与一切人相敌对的孤独个体。为了刻画这种人的存在与本质的分裂，哲学共产主义者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异化”这个术语。哲学共产主义强调异化（外化）问题，强调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冲突。其结论就是：要使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相和谐，必须使社会秩序建立在“共同体”即共产主义原则的基础上。

穆尔指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从哲学共产主义观点出发写作的。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区分了三种共产主义理论：处于最低层次的是粗陋的共产主义。粗陋的共产主义以平等的名义攻击文化，以共同体的名义攻击婚姻。处于中间层次的共产主义有两种形式：“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的共产主义。处于最低和中间层次的共产主义是形形色色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包括巴贝夫、卡贝、布朗基、德萨米、魏特林等人的学说。处于最高层次的是哲学共产主义，即作为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它是人和人、个体和类、存在和本质之间的矛盾的最后的解决。其代表人物是赫斯、恩格斯和马克思本人。

与塔克不同的是，穆尔认为，直到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并帮助其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哲学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才最终结合起来。尽管有这种差异，他们二人在马克思有过哲学共产主义思想发展阶段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其实也是众多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

二、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社会描述的讨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企图详细设计未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持批判态度，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描述是谨慎而且是粗线条的，甚至被认为是模棱两可的。因此，马克思到底如何看待未来社会，这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中引起争论，西方学者的看法也分歧很大。英国著名马克思学者特雷尔·卡弗在《后现代马克思》第5章“技术与乌托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12]中，对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社会描述的争论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献综述，由此我们可以管窥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描述所做研究的概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话：“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产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

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3]卡弗指出，对这段话的评论可分为四派。第一派学者对马克思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该派学者抓住这段话作为马克思思想贫乏、不切实际和极其轻浮的证据，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没有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描述分工，也未能表明分工可以这段话中所说的那些想入非非的方式消灭分工。这些学者认为马克思说这段话的意图是严肃的，而且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前工业活动（打猎、捕鱼）与马克思在别处关于共产主义必须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表白之间的明显不一致也并不使这些学者感到烦恼，因为他们认为不值得做进一步讨论。这一派学者包括：Kostas Axelos[14]，R.N.Berki[15]，M.M.Bober[16]，Bruce Mazlish[17]，Alec Nove[18]，Peter Singer[19]。

第二派学者对马克思持不同程度的同情态度，他们也认为马克思写这段话是极其严肃的。和第一派的学者一样，他们也不太为猎人和渔夫世界的技术不发达状态感到烦恼；但与第一派学者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拒绝考虑这段话所宣示的共产主义观，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对分工的批判是值得同情并给予批判性评述。这一派学者包括：Allen E. Buchanan[20]，G.A. Cohen[21]，Graeme Duncan[22]，Agnes Heller[23]，Bertell Ollman[24]，Paul Thomas[25]，Peter Worsley[26]。

第三派学者也对马克思持同情态度，但忽略对该段话的讨论。之所以这样，卡弗认为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疏忽，而是一种避免尴尬的战略，也就是这些学者想避免面对马克思就共产主义社会所做别出心裁的幼稚描述（即某些前工业活动如打猎和捕鱼与另外一些无用的智力活动如晚饭后从事批判的混合物）时所出现的尴尬。这些学者觉得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就共产主义问题发表的评论更适合于他们作批判性评述，因为这些评论与个体自主性的扩展以及现代工业生产创造性的延续（如集体计划和控制）有关，而且这些评论包含着对分工更抽象也更可行的分析。这一派的学者包括：J.M.Barbalet[27]，Isaiah Berlin[28]，Jon Elster[29]，Ben Fine[30]，Alan Gilbert[31]，Richard N. Hunt[32]，Leszek Kolakowski[33]，George Lichtheim[34]，John McMurtry[35]，Herbert Marcuse[36]，Melvin Rader[37]，William H. Shaw[38]，Wal Suchting[39]，John Torrance[40]，Allen W. Wood[41]

第四派学者与第二和第三派学者一样，对马克思持同情态度。他们与第三派学者的区别在于突出马克思的这段话，而不是忽略它。他们并不隐瞒自己对马克思关于前工业共产主义与工业共产主义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的困惑，他们突出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看法上的矛盾之处，他们觉得要阐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分工的观点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卡弗进一步具体分析了这派学者的观点：

阿尔都塞把《德意志意识形态》同所谓马克思与“非科学的”人道主义的决裂以及向“科学的”观点的发展联系起来。对阿尔都塞来说，这一看法本身就排除了关于技术和分工的任何幼稚观点。他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关于分工的模棱两可的说法看作是他自己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理论的证据，因而这些模棱两可的说法就不再令人困惑了。[42]

阿瑟却真的为马克思的这段话感到困惑。他在《劳动辩证法：马克思及其与黑格尔的关系》一书中说：“马克思的这一说法非常吻合傅立叶在其乌托邦方案中所勾画的工作日状况。这种田园风光很可能是一种讽刺，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已经批判了傅立叶把农业生产作为典范的做法。但这种解决分工问题的一般观念显然不是讽刺性的。然而人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不可能通过把一堆碎片整理起来就克服当前的生产分工。”[43]但阿瑟并没有解释为什么马克思的说法是讽刺性的。

Avineri不觉得马克思的这段话有反讽意味。他转而对分工进行阐明以摆脱技术问题：“这些田园般的畜牧职业何以能够成为废除复杂工业社会中的分工的典范，这自然是一个问题，该问题期待有一个答案，但答案并不存在于马克思这个或那个著述中。马克思选择这样一个田园风光般的例子可能是要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赞成现代社会的理由存在着内在困难。然而，人们如果接受马克思关于人是类存在的观点，那么他就能想象一个人的职业何以能引起另一个人的满足。……因此即使分工是必要的，一个人仍然可以从从别人的职业中获得愉悦和满足，只要社会结构朝向这种可能性。”[44]

Callinicos采取了与Avineri类似的策略：“评论者通常把这副画面斥之为乌托邦。人们确实可以怀疑马克思的字面意思到底是什么，而且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所列举的所有这些职业都可以在前工业传统社会中找到。然而，这段话是以下面这一严肃论点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将使人们从作为经济机器齿轮的现有角色中解放出来。”[45]

Evans提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这段话确实是严肃的，但后来马克思改变了他的观点。Evans通过引用《大纲》中的话，试图解释马克思确实改变了在分工问题上以及在共产主义社会工业技术必要性问题上的观点。[46]McBride认为这段话只是挖苦，还没到玩笑的地步。[47]麦克莱伦则认为这是马克思在模仿施蒂纳在说话。[48]后来麦克莱伦放弃了这一看法，和Evans一样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说法是严肃，后来改变了观点。Plamenatz持有同Evans和麦克莱伦相同的观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描述的理想状态尽管没有被马克思明确否定，但还是被放弃了。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工业社会，人们（工人本身）将细心而复杂地组织生产。”[49]施密特建议告别马克思“早期对完全废除分工可能性的浪漫信念”，因为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对该问题做了更具体的讨论”。[50]

基于日本学者广松涉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新版本，卡弗对马克思的这段话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接近原始手稿，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哪些是马克思的笔迹，哪些是恩格斯的笔迹。卡弗认为，根据广松版，那段著名的话实际上出自恩格斯之手，马克思只是插入了几个词：“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晚饭后从事批判”、“或批判者”。

马克思插入这几个词是想通过模仿取笑这段话，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猎人和渔夫前工业时期的职业，猎人和渔夫的说法是乌托邦的、幼稚的，是恩格斯对傅立叶的无意识模仿。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草稿和做修改时意见并不统一，两者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争论。卡弗认为，如果基于广松版来考察这段话，那么所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与后来著作中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之间存在矛盾和不一致之处的说法就不再成立了，上述各派学者所力图回避或着力加以讨论的困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笔者不同意卡弗的这一观点。仅仅根据广松版并不能确认那段著名的话是出自恩格斯或出自马克思。实际上，广松涉正是根据他自己的这个版本武断地得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表述的唯物史观主要出自恩格斯，马克思只是主要由恩格斯阐发的唯物史观的被动接受者这一极端的结论。而这一结论已经被日本学者后来更扎实的版本考证所推翻。在我看来，整个“费尔巴哈”章都是马克思一人所写，恩格斯只是在誊抄时做了少量修改。[51]至于那段著名的话出是否真正代表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图景的严肃看法，则需做进一步讨论。

三、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是否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争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就是西方学者常说的“后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称作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后来列宁进一步明确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思想有大量论述，而由穆尔引发的关于马克思是否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争论，则是其中颇具特色的研究新动向。

穆尔在《马克思与市场》[52]一书中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实际上隐含着马克思的下述思想：在资本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即人道的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即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为哲学共产主义的胜利扫清道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还受私有财产原则的侵染。在其经济生活中，生产者不取收入以购买商品，但生产者工作是为了满足自己而非公共性的需要。因此，就他们还没有把工作本身看作目的而言，生产者仍然是为了报酬而工作。

穆尔指出，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布雷像蒲鲁东那样提出了一种无阶级的交换经济的设想。与蒲鲁东不同的是，布雷没有把这种无阶级的交换经济看作是最终目标，而只是把它看作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布雷说：“如果要顺利实现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就必须改变人的性格；如果现在的制度没有条件和可能来改变这种性格，使人们达到合乎我们理想的更好的状态，那末显而易见，情况就必然会保持原状，否则就必须发现和实行一种过渡的社会阶段——既部分属于现在的制度、部分属于将来的制度的过程——或者某种中间阶段，社会进入这个阶段时将带着自身的各种弊病和愚蠢，以后出来时却带着财产公有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各种品质和特点。”[53]穆尔进一步指出，尽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布雷进行了批判，但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十条过渡措施的理由却非常接近布雷：“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54]如果再联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说法：“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那么穆尔关于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过渡社会思想接近布雷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穆尔认为，实施《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十条过渡措施的直接结果就是混合经济（既存在资本主义部门，也存在社会主义部门），在混合经济中存在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这是一个废除了剥削但仍保留交换的无阶级经济，是有市场（它受计划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市场社会主义”。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社会主义（即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这说明马克思后来放弃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也就是用第二种类型的无阶级经济（既废除剥削也废除了交换）代替了第一种类型的无阶级经济（废除了剥削但仍保留交换）。穆尔认为第一种类型的无阶级经济是更低一级的社会主义，尽管穆尔没有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

穆尔关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过渡措施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说法几年后产生了反响，引发了詹姆斯·劳勒与伯特尔·奥尔曼之间关于马克思是否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论战。论战双方的论文收在由奥尔曼编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一书中，并已由段忠桥译成中文。

和穆尔一样，劳勒也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过渡措施是市场社会主义。劳勒指出，就《共产党宣言》而言，一个革命后的、主要以发展市场社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的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纲领开创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或至少是一种“混合的社会”，这种混合的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成分，并能动地，并能动地突出了社会主义的方面。由于国家所有制是无产阶级财产的主要形式，由共产主义革命开创的这一经济制度可被称为“国家市场社会主义”。[55]劳勒还进一步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来印证这种对理解是正确的。根据恩格斯的相关论述，货币不能靠法令取消，而只能像国家一样逐渐消亡。因此在已无必要使用货币之前，市场关系还会继续存在。对私有制不是“消灭”，而是“限制”。限制的方法是“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而非“废除继承权”。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带来一个强行没收资产阶级财产的政权，而是采用累进税制度，并通过遗产税来消灭“不劳而获”的财富。因此对市场生产的尊重将得到遵守。无产阶级政府的最切近的目标不是消除竞争本身，而是要消除工人间对他们劳动力价格的竞争。后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包

括资本主义企业在内的市场关系将继续存在。在第二阶段，对经济的经营将通过劳动人民本身来实现。用恩格斯的话来讲，货币-市场关系只是在后一个阶段才停止起重要的经济作用。当然，由无产阶级国家开创的市场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由于无产阶级国家的自觉管理，市场开始起反对资产阶级和维护无产阶级的作用。合理的或自觉的因素——计划改变了市场的生产，而不是简单地取代了市场。这样“社会主义的”市场就开始存在。[56]

劳勒认为，革命后社会的长远目标是不存在市场的共产主义。但这并不排除作为中间阶段的一个长期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一时期是实现这一最终目标的开端。提出了更为综合的关于结束商品生产论证的《资本论》和后来的著作，却继续支持了一个处于中间的市场方向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存在。劳勒提出的证据是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关于马克思对革命后的大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实行赎买的思想。即使在被穆尔认为马克思放弃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劳勒也发现了马克思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证据，这就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的思想，因为在劳勒看来这一过渡时期就是《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纲领所属的历史时期。[57]

劳勒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共产主义发展有五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工厂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这些法规和类似的规范市场交换的形式可以说是在播撒新社会的种子。在第二阶段，社会的“最初的萌芽”是合作企业，包括工厂和农场，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人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雇主，并证明他们可以在市场的框架中成功地与资本主义企业竞争。在第三阶段是革命后将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时期。这一阶段结束于对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消除。在第四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存在，但商品生产仍然继续起重要作用，因为更为直接地自觉组织生产的方式还没有出现。在第五阶段，合作生产已发展到国家乃至国际的水平，但它在“各方面”还带有其资本主义起源的烙印。总之，劳勒比穆尔走得更远，他认为马克思自始至终是个市场社会主义者。

奥尔曼不同意劳勒对马克思思想所做的解读。他指出，劳勒对恩格斯话的引用是对恩格斯思想的曲解，因为恩格斯被弄得好像是一个居支配地位的合作经济的支持者；类似地，劳勒关于马克思提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新社会的最初的萌芽”的合作工厂的思想也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因为在奥尔曼看来，“萌芽”毕竟不是树，甚至连小树也不是；“怀孕”也不同于怀里抱着小孩。此外，劳勒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中“劳动凭证”的论述指的是一种货币，并以此为根据声称马克思认可市场的继续存在。奥尔曼认为，由于“劳动凭证”在功能上受诸多限制，因而把它称为货币是错误的，把它们于其中进行的交换看作是市场也同样是误入歧途的。

劳勒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也许有些离谱，但奥尔曼对劳勒的批评并没有切中要害，更多地纠缠于枝节问题。因此，对于马克思是否市场社会主义者，似乎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不管谁对谁错，这种讨论本身毕竟加深了人们对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包括作为其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对中国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注释

-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1页。
- [2] 参见Robert C. Tucker, *Philosophy & Myth in Karl Marx*,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第VII章。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5页。
- [4] 参见Maximilien Rubel, *Rubel on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第104页注37。
- [5] Davis Koigen, *Zur Vorgeschichte des modernen philosophischen Sozialismus in Deutschland*, Berne: 1901.
- [6] Charles Andler, *Introduction historique et commentaire au Manifeste Communiste*, Paris: 1901.
- [7] Gustav Adler,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sozialpolitischen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Breslau: 1885.
- [8] Sidney Hook, *From Hegel to Marx: 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Karl Marx*,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6页。
- [10] 参见Robert C. Tucker, *Philosophy & Myth in Karl Marx*, 第三篇。
- [11] Stanley Moore, *Marx on the Choice between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12] 参见Terrell Carver, *The Postmodern Marx*,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第5章。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85页。
- [14] 参见Kostas Axelos, *Alienation, Praxis and Techne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trans. Ronald Bruzin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6), 第257-8页。
- [15] 参见R. N. Berki, *Insight and Vision: The Problem of Communism in Marx's Thought* (Dent, 1983), 第74-5页。
- [16] 参见M. M. Bober, *Karl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edn (Norton, 1965), 第287-8页。

- [17] 参见Bruce Mazlish, *The Meaning of Karl Mar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第94-5页。
- [18] 参见Alec Nove,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Allen & Unwin, 1983), 第46-7页。
- [19] 参见Peter Singer, *Mar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第60-4页。
- [20] 参见Allen E. Buchanan, *Marx and Justic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 (Methuen, 1982), 第22-4页。
- [21] 参见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第132-3页。
- [22] 参见Graeme Duncan, *Marx and Mill: Two Views of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Harmo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第182-3页。
- [23] 参见Agnes Heller, *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 (Allison & Busby, 1976), 第105-9页。
- [24] 参见Bertell Ollman,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第160-1页。
- [25] 参见Paul Thomas, *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第148-9页。
- [26] 参见Peter Worsley, *Marx and Marxism* (Ellis Horwood, 1982), 第88-9页。
- [27] 参见J. M. Barbalet, *Marx's Construction of Social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 [28] 参见Isaia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4th ed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29] 参见Jo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0] 参见Ben Fine, "Communism", in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ed. Tom Bottomore et al. (Basil Blackwell, 1983), 第87-90页。
- [31] 参见Alan Gilbert, *Marx's Politics* (Martin Robertson, 1981)。
- [32] 参见Richard N. Hunt,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1: Marxism and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818-1850* (Macmillan, 1975)。
- [33] 参见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ts Rise, Growth, and Dissolution, vol. 1: The Founders*, trans. P. S. Fall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34] 参见George Lichtheim, *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2nd ed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5)。
- [35] 参见John McMurtry, *The Structure of Marx's Worldvie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36] 参见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2nd ed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5)。
- [37] 参见Melvin Rader,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38] 参见William H. Shaw,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Hutchinson, 1978)。
- [39] 参见Wal Suchting, *Marx: An Introduction* (Harvester/Wheatsheaf, 1983)。
- [40] 参见John Torrance, *Estrangement, Alienation and Exploitation: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cmillan, 1977)。
- [41] 参见Allen W. Wood, *Karl Marx*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 [42] 参见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Allen & Unwin, 1969), 第36-7页。
- [43] 参见C. J. Arthur, *Dialectics of Labour: Marx and his Relation to Hegel* (Basil Blackwell, 1986), 第137页。
- [44] 参见Shlomo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第231-2页。
- [45] 参见Alex Callinicos, *The Revolutionary Ideas of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第175页。
- [46] 参见Michael Evans, *Karl Marx* (Allen & Unwin, 1975), 第159-160页。
- [47] 参见William Leon McBride, *The Philosophy of Marx* (Hutchinson, 1977), 第129页。
- [48] 参见David McLellan,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Karl Marx* (Macmillan, 1969), 第132页。
- [49] 参见John Plamenatz, *Karl Marx's Philosophy of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第143-144页。
- [50] 参见Alfred Schmidt,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trans. Ben Fowkes (New Left Books, 1971), 第146页。
- [51] 关于这一观点, 可参见拙文“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排序问题”, 载《哲学动态》2006年第2期。
- [52] Stanley Moore, *Marx Versus Markets*,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53]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第114页。
- [5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 第293页。
- [55] 参见奥尔曼编, 段忠桥译《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第26页。
- [56] 《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第30-35页。

[57] 《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第41-46页。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 (作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上一条 俄罗斯学者巴加图里亚谈《共产党宣言》
下一条 经典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 ——《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传播史新探

[网络链接](#) |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设计制作：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